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日常生活為切入角度，探索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多元且深度的手機使用樣貌。我試圖從青少年族群的手機文化中，找尋隱藏於現象背後的動機、意義與能動性，以理解手機這項媒體科技，是如何嵌入青少年受制的文化結構裡，並進一步成為無形的武器，被青少年挪用來與成人所建立的結構抗衡。

由於重視脈絡性的觀察、以及個體的分殊性與多樣性，我採取質化研究的取徑，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並蒐集青少年手機實踐的實物文本，再輔以受訪者一週手機使用日誌，取得使用者主觀經驗、文本以及日常生活脈絡三面向的資料，並將這些資料帶入 Lefebvre 與 de Certeau 的日常生活相關理論做整理、分析。

最後，我將在本章發展綜合性的論述，在第一節中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而第二節則站在本研究結論基礎之上，提出未來看待青少年手機文化現象時的新觀點與建議。

第一節 討論與結論

本節將第四章的分析論述，與第一章第五節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再次對應，並更進一步做理論化的討論，提出手機在日常生活中的辯證性質，以及手機作為一種與外在結構抗衡的媒介所具有的內涵。

一、 在日常生活中的手機使用

首先回應研究問題 1：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挪用與棄用的方式，以及經由使用而創造出的文本樣貌。本研究發現，手機的使用牢牢嵌入日常生活的循環中，並展現出集體使用的特徵，也因為生活結構受到層層限制，因此會將原本作為通信工具的手機，挪用為在學校、家庭中找尋機會突破規範限制的利器。而這些使用的過程，也產生了形形色色的文本，包含視覺(文字、影像與圖片)、聽覺(鈴聲)、以及融合視覺與觸覺(如手機外的裝飾)等等的形式，正如第四章各節中呈現的資料。

而承續以上的資料發現，以下將研究問題 2、3、4 提出的「青少年在結構中的位置」、「多元豐富的手機實踐背後的動機與意義」、「能否展現能動性與抵抗結構的意涵」，以統整性的方式進一步討論。

二、手機在日常生活中的辯證性特質

手機一方面嵌入日常生活的循環，讓青少年的生活在結構之中安然運行，另一方面卻也提供從日常生活中遁逃的契機。

在 Lefebver 的觀點中，日常生活的重複與循環是人類賴以生存、以及再生產的基礎(Highmore, 2004/周群英譯, 2005)，而從第四章第一節中，青少年的手機使用，也具體而微地呈現出這樣的特色。不論是在固定時間使用特定的功能、或是為了確認關係而產生的重複人際召喚、或是用手機來律化生活，透過這些手機活動，讓生活保有一種秩序。也就是說，隨身攜帶的手機，就如同可以隨環境脈絡轉換意義的閘門，在日常生活不同的時空裡，展現不同的儀式意義，透過手機的運作，使用者從可以從生活中的一個階段過渡到下一個階段，讓青少年得以重覆確認自身的社會關係與狀態，並在各種活動與事件的循環之中繼續往前行進。

然而，這種依著結構的重複循環來運行的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帶來許多「無聊」的片段。我們在第四章第四節中得知，面對結構限制下的無聊狀態，青少年無力革命以改變結構、也無法逃離；但是，手機的普遍性，幾乎人人都能取得，當手機入場之後，不但可具有隱匿性，加上多元的功能與挪用的潛力，青少年使用手機遊刃有餘，用手機來找尋結構的縫隙，以脫離無聊的狀態。但這些作為，完全沒有破壞原本的結構，青少年也沒有因此衝破結構的範圍，但卻已經擾動了原本的秩序。另一方面，因為還是在結構中活動，因此在必要的時候，她們仍可以隨時回到原位，正如圖 5-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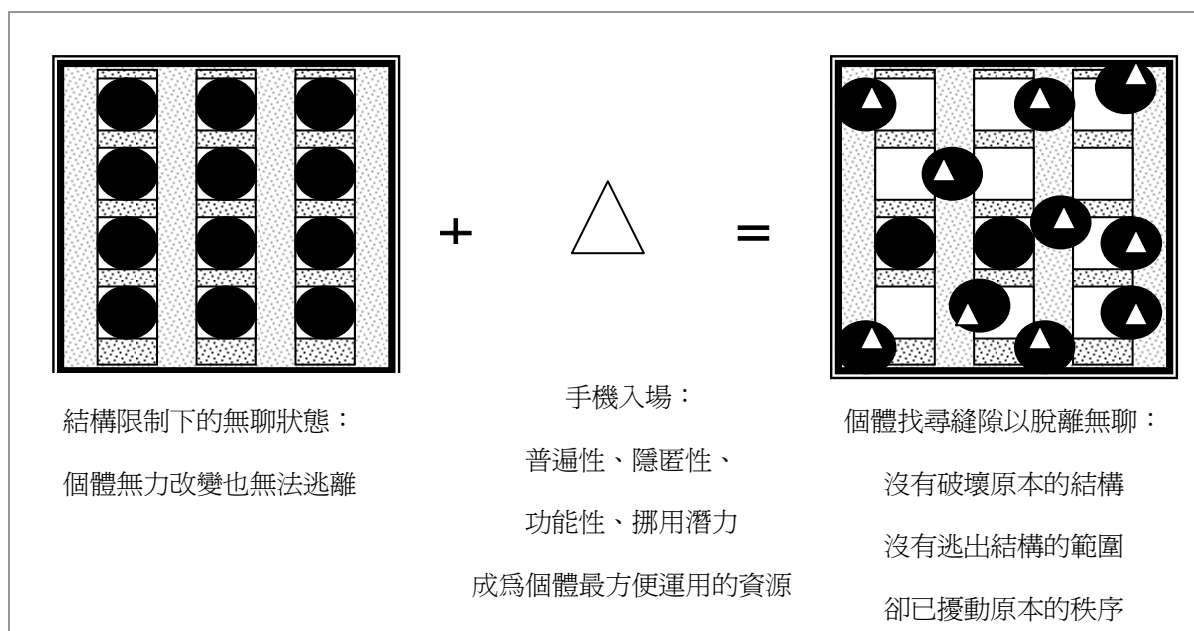


圖 5-1 手機作為擾動結構秩序與無聊的資源

而正是 de Certeau 說的「戰術」，弱者的戰術得以在權力的監視下延展開來，在權力之中創造驚奇。戰術變成權力最無法預期的事，是一個狡猾的策術。戰術不會在其所能面臨的策略之外進行運作，「他們脫離它，卻沒有離開它」(escape without leaving)，我們不會在戰略操作的「外在」發現戰術的存在(de Certeau, 1984)。也就是說，因為有這些外在結構的戰略，才有青少年的戰術產生；因為有結構的無聊，才有這些隱諱的創造。這些創造，確實擾動了既有的秩序的創造，因此可視為對結構的抵抗。也就是說，青少年持著手機，以無聊之名，行抵抗之實。

因此，手機的辯證性特質，在於它一方面參與了型塑日常生活結構循環的過程，另一方面卻也提供了青少年與結構相抗衡的機會。

三、手機使用對外在結構的抗衡

(一) 分享與認同是抗衡的基礎

在結構的限制之下，個體與個體之間聯繫與交流的方式是被框限的，而青少年而運用手機隱匿的特性，除了塑造出與同儕共同在場的氛圍(Rheingold, 2002 / 張逸安譯, 2004)，更形成可在限制之中密集溝通分享的網絡，藉由展示、分享並交流各種手機文本與硬體，突破手機原初私人媒體的本質，展現同儕集體使用的特徵。此外，透過手機上珍藏的文本、使用手機的方式以及手機這個裝置本身，來建立話題、開展人際關係、並交換彼此的評價，正如 Habuchi(2005)所提出的，手機是人與機器之間一對一關係最緊密相連的一種媒介，因而在頻繁不斷地傳播、互動、與回饋的過程中，成為型塑青少年是日常生活中認同的關鍵因素。

而透過手機而產生的分享與認同，青少年在結構之中佈下了隱匿的網路，奠定與結構抗衡的基礎。也就是說，個人媒體的集體使用，是為了在結構中「游移」與「游擊」作準備。

(二) 在結構中游移與游擊的手機戰術

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情境，被成人結構所籌劃的戰略所限定，處處充滿監視與規範。但青少年努力找機會使用手機，並更進一步挪用手機來挑戰規範。這種挑戰並非正面的抗爭衝突，而是迂迴分散的戰術，在成人掌權的結構之下，找尋縫隙略作發揮。當發揮的空間較小時，例如在家庭情境中，青少年進行的可能只閃

避規範的「游移」；而發揮的空間較大時，則產生擾亂結構規範的「游擊」。

而這些行動，再透過前述分享與認同的網絡，在青少年之間傳遞開來，例如她們偷渡手機進入課堂，並在課堂上找尋師長權力形象的破綻，記錄下來，收納進手機，再與所認同的同儕分享，強化顛覆壓制的意義。

因此，手機可以視為一種日常生活中的武器，青少年學生在被成人結構化的空間與時間中，持著手機，到處游移，並找尋機會打游擊。

(三) 手機是日常生活詮釋權的下放

青少年在結構之間游移的路線，以 de Certeau(1984)的語彙來說，為「不明確彈道」，行動之後並無法在空間中保留痕跡，揮之即散。但手機卻改變了這個狀態，如圖 5-2 所示，彈道上每個歷時性的點，都被青少年納入手機，在手機中再度組合，讓游移與游擊的痕跡保留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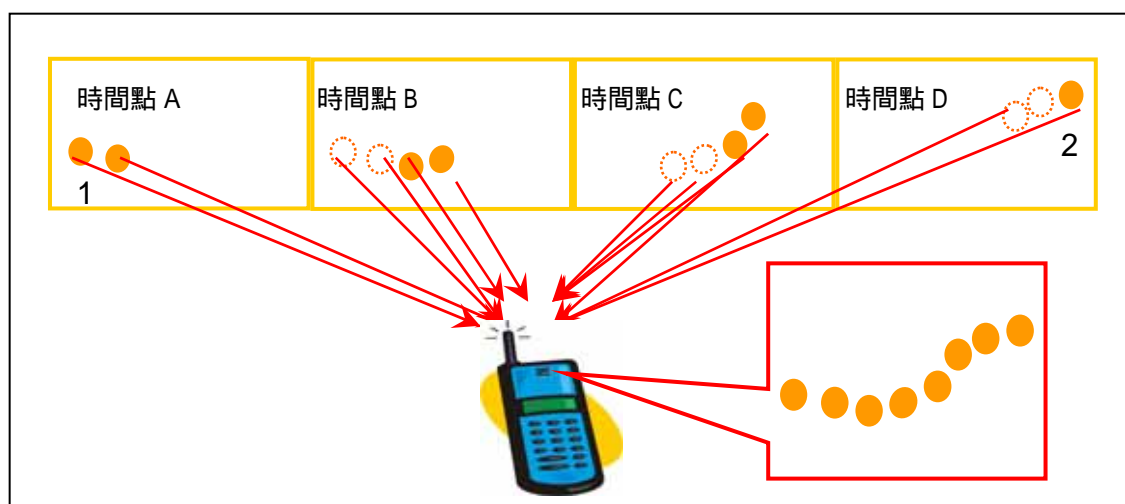


圖 5-2 無形的彈道被手機記錄、組合為有形的軌跡

而這些逾矩的紀錄被納進手機裡之後，依據前面的分析得知，青少年會與同儕或手足交換分享、或是在結構中的無聊時刻重複瀏覽、編輯。而青少年每從手機中「叫」出這些紀錄一次，這些紀錄都會再度彰顯一次與結構抗衡的意義。

因此，青少年的手機使用，將無形化為有形，超越了 De Certeau 的「彈道只是一種殘餘」的說法。她們將此殘餘回收進手機，雖然無法改變結構，但能重複提取這些事件的抵抗性意義，於是，這些在結構的戰略底下游移的作為，不再只是馬上就會被抹去的記號。媒體科技意義之下的「手機」，變成是青少年「手中的機會」，以此來與結構抗衡；更是「手機／跡」讓青少年能在自己手留下反抗結構的痕跡。

更重要的是，當青少女拿起手機，用簡訊文字、照片、錄影等各種形式將自己在結構中游移的片段或過程記錄下來時，也正在標示自己位於結構中的意義。在青少女這個年齡階段，她們被限制的不仅是時間、空間，就生活的方式、未來的意義，都是成人所制定的外在結構所賦予的。而手機，卻讓青少女可自行定義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與場景，突破預先被結構設定的意義，將日常生活中的瑣碎片段重新標示上屬於自身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手機的使用，讓詮釋、定義生活的權力，下放至青少女手中。

而本研究的結論與分析，並沒有要將研究結果概推至全體青少女，而是試圖說明，這一個世代感知、認識、使用、探索手機這項媒體的方式，已經超越上一代對媒體的傳統經驗與期待，是制定結構的成人所尚未理解的。青少女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結構的嚴厲，因而想要有所突破，而手機恰好是此世代最貼身且熟悉的媒體，於是她們將手機使用與這種想從結構中突圍的意念做連結，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經驗。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手機使用與日常生活的新觀點

(一) 手機可成為「為自己發聲」的行動工作站

在第一章我曾提及，手機可作為行動個人舞台、個人作品集、個人博物館，用以收納展示各種個人文本。而經過研究之後發現，青少女透過手機生產、編輯、詮釋、發布各種文本，再將文本標示上屬於自身的意義，除了在結構中展現出抵抗的意涵之外，也可進一步將手機視為「為自己發聲」的行動工作站。

手機是與人的一對一關係特別緊密相連的一種媒介，並具備普及性、隱匿性、以及可供挪用的潛能，而對處於邁向獨立的成長階段、卻在結構中位於相對弱勢的青少女來說，手機正好是最能取得與運用的資源，以此來產製自己的文本、訴說自己的意義、分享自己的觀點。

而更進一步來看，青少女透過手機所創作的，不只是手機上看得見的文本而已。如果把日常生活的結構也視為一種文本，那麼，青少女在日常生活中的手機實踐，就正如 de Certeau(1984)所提出的，是在這個文本上盜獵，挪用原本的素

材，創造出自己的意義。而這個創造意義的過程，更是一種生活上的創作。

以上的論述，都可以看出手機在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性。我們彰顯日常生活的政治性，並不是爲了提出一個正確的解決之道，也並非要將壓迫予以顛覆，而是試圖將此視爲一種啓發性、試驗性的政治，將信心放在日常生活之中，以作爲改變日常生活自身的手段(Highmore, 2004 / 周群英譯, 2005)。

因此，基於手機是一項具備高度創造意義的媒介、也具有成爲行動工作站的潛能，本研究建議，在看待家庭、學校、以及社會中的各種場域青少年(甚至擴及至青少年)的手機文化實踐時，應將她／他們高度被結構化的生活脈絡合併思考，重視在青少年受制的日常生活中「爲自己發聲」的意涵，

(二) 手機素養的新領域

承前面的討論，手機成爲目前青少年在高度結構化的生活中最善於使用的媒體。其中有充滿創造性的應用與挪用，能爲青少年賦權；但或許也會產生誤用而帶來傷害，例如第一章曾提及新聞中的手機霸凌現象。正如前面提到的，手機具有可移動、可隨時進入、可穿戴、以及即時分享性，這些特質都與過去的媒體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在面對青少年與手機使用的關係時，如果繼續延用過去的媒體素養觀，著重在平衡「訊息產製者」與「接收者」的權力關係，也就是以「絕對規則制定者 v.s. 一般大眾」的脈絡來看，將會產生無法適用的問題(Misukoshi, 2005)。

手機的使用是高度脈絡化的，隨著使用者身處的情境而轉換不同的意義，例如在前面的章節我們發現：在家庭中手機是親子關係控制與解放兩相拉扯的關鍵；在學校裡手機可以是擾動教室權力結構的武器；而在特定的時間手機會型塑日常生活重複與循環的結構，但在某些時刻又提供青少年突破結構的機會。我們可以說，手機在日常生活中多元的脈絡下，創造出多元的使用經驗，也在兩者之間構連出特殊的意義，暗中顛覆了既有的規則。因此，本研究中的手機、青少年與日常生活三者之間關係的討論，可以讓我們以新的角度來看手機嵌入人們生活的方式，作爲手機媒體素養的起點。

二、給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可聚焦於性別的概念

本研究詳加探討的，是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透過手機展現出與結構抗衡的意

涵，而這裡的結構是屬於日常生活一般性的。而日後的青少年手機研究，可更聚焦於性別的概念上，討論手機如何被整合進性別化了的文化中、如何影響此年齡階段的女性經驗。

也可以本研究為基礎，而轉而以青少年中的男性為研究對象，從而比較結構中性別因素所帶來的結果與意義。

(二) 可配合觀察法以貼近日常生活脈絡

為了更貼近被研究者的生活脈絡，得到更為完整的日常生活樣貌，除了深度訪談、手機使用日誌之外，直接進入青少年生活，採用貼身觀察的方式，更能得到細微的資料。如此一來，除了能看到手機日誌中受訪者主觀意識察覺的活動之外，更能發現預期之外的重要資料。

(三) 進一步研究手機為使用者發聲的可能

本研究發現，手機成為在青少年日常生活中與結構抗衡的媒介，也成為青少年標示出屬於自身的日常生活意義，因此，延續前一節的建議，日後的青少年手機研究中，可以更加重視手機在日常生活中成為行動工作站、為青少年、或是在結構中相對弱勢的族群發聲的可能性。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性別的位置隱晦不明

本研究探討的對象為青少年，分析論述的過程中，僅聚焦於手機使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性別」的位置卻隱晦不明。究其原因，是因為訪談資料蒐集時，難以獲得專注於性別差異經驗的資料。而進行女性與新媒體科技的研究室，更應該釐清的是新媒體科技如何被整合進性別化了的文化中、以及這項科技在物質上與象徵上的特質如何影響女性的經驗、是否也產生哪些「去性別化」的實踐等等問題(Lee, 2005)。

二、 日常生活拼圖的缺漏

本研究的資料分布僅在於學校、補習班、家庭與其他某些青少年主動提及的日常生活場域裡。而日常生活是生活中所有活動的聚合，面向廣大，本研究所拼湊出的日常生活的拼圖，可能是缺漏的。例如，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發現有個部份在青少年生活中應該佔有份量，但在本論文卻缺席了：青少年的感情經驗。過去研究中曾發現，手機是私立女校學生用以突破校園情愛禁忌的媒介(姜穎，2008)，而在本研究的訪談之中偶爾也會碰觸到這個話題，但受訪者主動深入敘述的意願並不高，因此遺失了這部份的論述。

三、 研究方法上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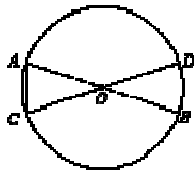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與受訪者自我記錄的方式進行，這兩種方式所獲得的資料是經由經訪者主觀詮釋而來，並無法與其他觀點交相討論、進行驗證。此外，手機使用日誌的方面，某些受訪者無法將一天當中所有關於手機的活動都詳細記下；而能詳實記錄的受訪者，也只能記載自我能意識到的活動，一些太過習以為常而無意識的動作，或是受訪者主觀認為不具記錄價值的作為，是無法在手機使用日誌中看到的，而這些在主觀意識中缺席的活動與動作，更具有分析研究的價值。

四、 抵抗意涵的論述難題

在各種研究抵抗意涵的研究中，都蘊含著「抵抗必然存在」的預設。然而，「個人經驗不必然積累或產生顛覆結構的力量，個人（即使是受壓迫的）經驗沒有絕對必然性成為抗爭」，「如果研究者只能從被研究的認同中演繹出排他性的顛覆與反抗之可能，則研究者個人賦予認同的正面與負面意義也必須釐清處理。」(柯裕棻，2003)。

而在本研究中，一旦開始分析青少年在日常生活的結構下運用手機的意義時，就也面臨這樣的問題。青少年對於自己手機使用的詮釋，並非必然就是抵抗，而訪談資料的呈現也不必然象徵抵抗精神。而更退後一步想，其實受訪的青少年也不見得具有抵抗的意識，抵抗的意識是透過研究者的詮釋而得。我們所分析出的這些隱微抗爭，其中的意涵都必須透過理論轉介，才得以重新詮釋。為了避免產生理論與實際經驗上的斷裂，這層意義的轉介過程，應該必須更被細緻的討論。

第四節 結語



如圖，AB、CD 為圓O的兩條直徑，若

$\angle ACD = \angle 2AOC$ ，且圓O的半徑為 30 公分，則

$\angle BOC$ 所對的弧長是多少公分？(A) 10π (B) 12π

(C) 20π (D) 24π (二〇〇一第一次學測)

先別理會前面的測驗題了，那是學測的考古題。不管你會不會，答案並不重要。我只是想讓你知道大部分的時間，我們過著怎麼樣的生活而已。更精確地說，這些對你來說也許不痛不癢的事情，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切。而我們的生活，是過完那些重要的一切之後，剩下來的。

侯文詠，《危險心靈》

在侯文詠《危險心靈》這部小說的一開始，身為國三學生的敘事者就用一道數學考古題，說明了現今國中生的生活。弧長、 12π 、學測，這些對其他成人來說不痛不癢，卻是國中生「最重要的一切」。但這最重要的一切，卻不是「我們的生活」--過完「那些重要的一切」之後，「剩下來的」東西，才是屬於自己的生活。在成人所制定的結構中，國中生自己的生活是不重要且沒有意義的，自己的生活只是殘渣。

侯文詠的描寫，恰好就是 Lefebvre 對日常生活的觀點：當所有清晰的、優越的、專業的、結構性的活動，都被挑出來分析之後，那些「剩下來的」東西，就是日常生活(Lefebvre, 1958/1991)。

但就是這些「剩下來的」，才讓人們的日常生活充滿幽光；也只有在這些殘渣中，才能找到屬於青少年／女自身的意義。

而這些剩下來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在論文一開始提到的妹妹，現在已將升上大四，擁有一支家人「許可」、並為她支付帳單的手機。但我相信，當提起「手機」時，她必定會想起高二時在熄燈的房間裡偷偷充電的 Nokia8310 黑白手機。而高二這段時光，在她記憶中最鮮明的，也不會是高二數學課本裡的排列組合單元裡「 C_8^3 取 10」的演算習題，而是她在那段時間曾用手機試探框限規範的作為，她用一支沒有正當性的手機，重新排列組合出她高中生活的意義。這種「排列組合」不再是課本上的數字與公式，而是透過一支與自身如此貼近的手機，在結構中試探、游移、抗衡的圖像。

這才是青少年／女日常生活中雖然衰微卻充滿無限可能的力量。